

T t O C o R T

门槛上

h h n h f e h

的

r e i p e

民国

e n u

金满楼 著

s a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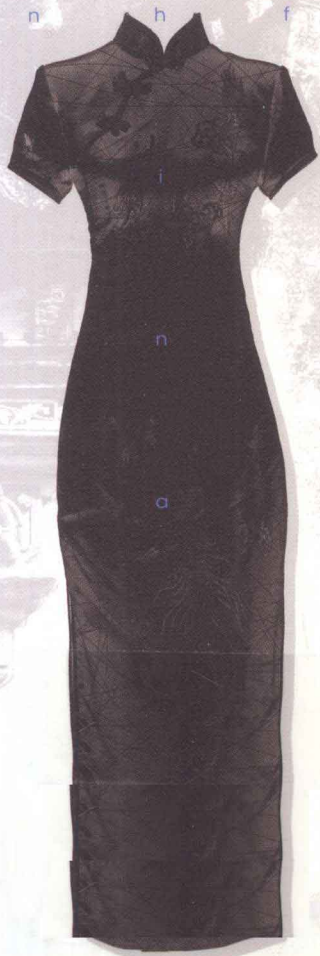
h l

o i

l c

d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门槛上的 的 民国

金满楼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门槛上的民国 / 金满楼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84-4

I. ①门… II. ①金… III. ①中国历史—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 K258.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8403 号

门槛上的民国

金满楼 著

策划编辑：东 洋

责任编辑：杨晓周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 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顧問：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19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一版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84-4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门楣上的民国

第一章 无法和谐的开始

1912年8月16日凌晨1点，也就是张振武被捕3个小时后，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这位首义元勋被绑在军法处的木桩上吃了六颗“花生米”，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仁了。临刑前，张振武仰天长啸：“想不到共和国也如此黑暗！”

- 一、非杀了他不可001
- 二、共和国也如此黑暗006

第二章 君宪，共和？——被抹杀的程序

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 一、有朋自敌营来015
- 二、革命未竟，先摘果实021
- 三、打是为了更好地谈026
- 四、“赶”出来的民国033
- 五、都是权力折腾的041

第三章 法统，争权？——一定都酿成大风波

“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当时南方革命党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如此情势，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一、你“下套”，我“下咒”050

二、定都背后大斗法057

第四章 王道，霸道？——有枪便是草头王

曾经的革命同路人，民国后获得的却是迥然不同的待遇。革命党人风光无限，地位急剧上升，而会党们依旧形象污秽，社会地位不升反降。最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作为昔日盟友的革命党人似乎也有意回避、冷落他们，生怕他们影响了自己的形象和地位，避之唯恐不及。

一、兵变流行渐成风068

二、就看谁的手腕硬078

三、绿林党称王称霸087

四、江湖子弟游侠忙094

第五章 人治，法治？——《临时约法》因人而设

革命党人这种多变之举“虽然意在保护革命成果”，却同时也首开了“因人立法”的非正之风。……仓促制订的《临时约法》非但没有成为革命党人限制袁世凯的法宝，反而成了民初政局混乱甚至导致南北决裂的害国利器。

一、《临时约法》是个早产儿101

二、防袁如防贼108

第六章 难产的中央：总统难当，总理难做

总统府的人，每次见了唐绍仪前来商讨政事，都私下里愤愤不平地说：“今日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么？”某次，唐总理又因某事与袁总统起了争执，唐说：“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我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袁世凯听后勃然作色道：“少川，我已老朽了，你来做这个总统，可好么？”

一、内阁难组116

二、总理难当125

三、首任总理开溜132

四、二任总理装病141

第七章 高层政治：巨头的握手

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在感谢。大总统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如今担任国事，实在值得国人庆贺”。说完，孙中山也高呼道：“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在前后两位大总统的“万岁”声中，宴会气氛一时达到高潮。

一、请神容易送神难150

二、“张振武案”余波未平161

三、“三雄会”上喜相逢170

第八章 司法跛脚，舆论跳脚

正因为其中党见的存在，或者说权力的介入，使得上述两宗案件不再仅仅是司法案件，而是转变成了政治事件，“姚荣泽案”尤其如此。民国司法甫一开始，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或沦为行政权力的附属品。

一、司法总长很无奈180

二、言论太“自由”189

第九章 民主角斗场：政党风云乱哄哄

建党无门槛，换党无忌惮。短短一年间，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如此生动活泼的党派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绝对是一种不怀好意的污蔑。……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因为这些所谓的“政党”，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承。

一、革命党消198

二、阿猫阿狗都组党208

三、大选没有新鲜事216

第十章 经济不自由，民主何处求？

辛亥革命中最离奇的一幕是，清廷的垮台竟然是因为“没钱”所导致。因为没钱，所以北洋军无法继续镇压革命军；而另一边，革命军也因为没钱，所以无力继续北伐。双方居然在这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上达成默契，王朝的倾覆也就以和平的方式了结。

一、崩溃的财政在继续227

二、放债的都是大爷237

第十一章 旧吏，新民？——民治还得慢慢来

普通民众对于辫子的这种心态，其实质上便是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心态。以清廷杀戮开始的辫子，最终却成了被奴役的民族心头难释的老旧文化心结，这无异是对两百多年前倒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泊之中的祖先们昔年所为的最具戏剧性的反讽。

一、剪与不剪：难缠的“国辫”246

二、放与不放：小脚里的大革命258

三、降与不降：不服从的遗老267

第十二章 尾声：民国会好吗？

无政党传统与民主习惯的中国，仅靠一次革命就想完成体制性的转变，这当然有些痴心妄想，毕竟中国不是美国，袁世凯也不是华盛顿。在一个专制痼习沉重的国家中，民初政党的蜂起固然可喜，但由散漫的多党制进化到稳定的两党制，这一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其中的设计者、主持者、继起者如无大谋大勇、大仁大智，断难成功。

民国元年（1912）大事记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章 无法和谐的开始

一、非杀了他不可

1912年毫无疑问是世界的中国年。

这一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中国自此步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共和时代。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以新奇的目光关注这个曾经垂朽的老大帝国；中国人自己，更是在翘首盼望着未来的各种美好景象。

但梦想有时毕竟无法照进现实。时隔半月，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昌又响起了刺耳的枪声，一群又一群暴动士兵冲出营房，他们一路鸣枪，一路高喊“打倒孙武”、“驱逐民贼”、“改良政治”的口号，分路向军务部和军务部长孙武家扑去。

参加暴动的士兵人数不下万人。事后调查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其中近卫军两千人、“将校团”三千人、“毕血会”一千八百人、学生军两千人，教导团、义勇团等也有不少士兵参与。

当晚，参与者臂缠“群英会”的白布袖章，分头出动，一齐涌

向街头。与半年前的武昌首义相比，这次的行动并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暴动士兵很快包围了都督府、军务部等要害部门并迅速控制了全城。

由于与事者动机不一，成分复杂，暴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骚乱，乱兵们四处放枪，大肆抢劫。夜色遮蔽之下，革命军第二镇统制、文学社重要成员张廷辅在骚乱中被乱兵射杀。被“千夫所指”的事主孙武侥幸逃到了汉口，其家小则被暴动士兵全部扣押。

或因为如此，历史上并没有把这次行动抬高为“二次革命”，而只是将之轻描淡写地称为“群英会事件”，因为它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场并不光彩的兵变。读者或许会问：“群英会事件”系谁人导演？它的答案是黄申芑——孙武之前的革命同志兼好友。

兄弟阋于墙，何至于此，其中必有不可为外人道的隐情。这事说来话长，得从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分配说起。

武昌首义之初，孙武本已被革命党内定为革命胜利后的湖北都督。可是那场催发革命的自制炸弹误爆事件让他彻底与都督这个职位无缘。不过这也无妨，身为湖北省内少有的几个“骨灰级”革命元老之一，革命成功后，他仍顺利地获取了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的职位。

随着地位的上升，孙武独断专横的作风也日渐暴露，他不但居功自傲，而且还不时排挤打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就连同属“共进会”的同志，也不例外。孙武的做法引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极大不满，他们私下里议论孙武：“做了几天新官就瞧不起人，要是长久下去，那还得了吗？”

没过多久，黄申芑也加入了这部分人，并进而成为“倒孙”事件的主要谋划者和实际领导者。这，恐怕是孙、黄二人相交之初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孙武生于1880年，曾入武备学堂从习军事，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并于庚子年参与唐才常“自立军”举义。据说，孙武在湖北发展革命时，常有人误认为他是孙文（即孙中山）之弟，而孙武亦笑而不语，不多作辩白。

孙、黄之交，渊源颇早。1906年，“日知会”成立，孙、黄均为这个革命团体的会员。“日知会”被破坏后，孙武流亡日本。在日期间，孙武先是加入了同盟会，后因不满孙中山、黄兴专注于华南起义的做法，而于1907年8月与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翠等人在日本东京另组“共进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络会党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后，孙武回国，随即以“共进会”的名义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

在运动会党与革命士兵的过程中，孙武再度与黄申芑重逢，而后者此时已是湖北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因此前均是“日知会”会员，孙武随即邀请黄申芑加入“共进会”。此后，“群治学社”中的一些鄂籍成员也陆续加入。在黄申芑的引荐下，其他一些革命小团体如黄元吉、汤舜卿的“文学研究社”，丁仁杰、萧国宝的“自治团”，李建中、梁维亚的“武德自治社”，向海潜、李绍白的“群英会”等也都相继加入了“共进会”。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抢米”风潮，“群治学社”打算趁机发难，后因消息走漏而事败。作为“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申芑逃亡上海，“群治学社”也被迫易名为“振武学社”，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到上千人。

黎元洪时任湖北新军协统，他探得“振武学社”的消息后，为防止事变，便将社长杨玉鹏开除出营。“振武学社”又被迫更名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为社长。至1911年7月，“文学社”成员已近三千人。

与此同时，孙武、张振武等人领导的“共进会”也在湖北新军及会党中联络了两千余人，成为与“文学社”并存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经数次会谈，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就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夕，“文学社”与“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建立了统一的指挥系统，孙武被推为起义部队的参谋长。革命成功后，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算是实至名归。

黄申芑却没有这样的幸运。论资历，他是“文学社”前身“群治学社”的主要负责人，与孙武同时参加过“日知会”，称他为资深的革命元老也不为过。可革命爆发时，黄申芑因清廷的通缉而流亡上海、安徽、江西等地。待他赶回武昌，军政府中的座次早已排定，这位首义的“迟到者”，仅被委任为民军第七协第十四标统带。

按理，孙、黄交往甚早，先前的合作也算融洽，应有一番旧谊。但黄申芑去军务部向老朋友、新上司孙武致谢（“谢委”）时，孙武却打着双赤脚，大咧咧地坐着，昂然不动，傲气逼人。见黄申芑来后，他只远远地问道：“你来了——很好。委札接到没有？”黄申芑不曾想自己会受到如此待遇，只好强忍怒气说：“接到了。我特来谢你的。”孙武对黄申芑的态度很不满意，他哼了一声，说：“标统不小啊，在满清，那是要戴蓝顶子^①的，你要好生的干，听着没有？”

黄申芑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炸了，他跟身边的人愤恨地说：“尧卿（孙武的字）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放在眼里——我非杀了他不可！”

经多次苦战后，黄申芑升任第八协统领，不久又调任湖北副总统府近卫军第二协统领，负责武昌城内的治安和都督府的保卫工作。令黄申芑感到恼火的是，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原是他主持“共进会”

^①按清官制，三品官帽为蓝宝石顶，四品官帽为深蓝色的青金石顶，二者均被时人俗称蓝顶子，故人们常用蓝顶子代指清代三、四品官阶。

会务期间亲自任命的十二个“大都尉”之一，其资历与能力远不能与自己相提并论，如今却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由此，黄申芎不免心怀不满，并认为这是孙武在背后故意捣鬼。

同志间的猜疑加上孙武的跋扈，最终引发了前文所述的这场大风潮。事后，逃到汉口的孙武开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调兵平乱，但此时他早已失去了革命士兵的支持。在根本无兵可调的情况下，孙武不得不发表辞职声明，滚蛋了事。

此时，湖北都督、临时副总统黎元洪正冷眼旁观。革命党人出现内讧，这是他所乐见的，原因很简单：黎元洪的人品固然不坏，但他只是一名循规蹈矩的旧军官，而决非以身搏命的革命者，对于革命或者说造反这种勾当，他始终心有抵触，甚至深恶痛绝。就在举义当晚，他还亲手杀死了前来联络革命的工程营士兵周荣棠。

至于那些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起事的革命者，他们对这位逼出来的前清协统也无好感，只是起义时事起仓促，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才匆忙间将公器相授，一旦危机过去，迟早还要闹出乱子乃至搞“二次革命”甚至“三次革命”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虽然被推为湖北都督，但当时坐镇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其实是人称“首义三武”的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三武”尚能与黎元洪通力合作，但在民国成立、各地局势日趋稳定后，军政府内部甚至革命党内部就不免罅隙丛生并明争暗斗了。

作为“共进会”领袖和原本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孙武本就威名在外；首义成功后，又出掌军政府军务部长，手握兵权，自然更是为世所重。如此人物，就连都督黎元洪也得忌惮几分。而孙武本人也是权欲太强，他上位之后，非但排挤“文学社”的蒋翊武这批同盟者，就连同为“共进会”的张振武等人，也视如水火，不肯

相容。

对于这一点，黎元洪自然心领神会，一有机会，他不免借势巧妙挑拨一番。如黄兴在汉阳失守后离开武汉，其所任“战时总司令”一职本应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不愿让后者掌握兵权，因而串通黎元洪改任蒋翊武为都督府顾问，“战时总司令”改由在湖北扎根不深的谭人凤出任。

孙武最初是“挟黎以自重”，但随着其地位的上升，黎元洪也难免有被取代的隐忧。“群英会事件”后，黎元洪立马抓住机会，他借“稳定湖北局势、满足暴动士兵要求”为由，将孙武等人撤职，并顺势改组了军务部。之后，事件的另一主角黄申芑也没捞到好处，他先是为革命同侪苛责，后又被礼送出境，东渡日本求学。

有难同当，有福难享。革命阵营的权力争斗最终成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闹剧，不禁令人歎歎！

二、共和国也如此黑暗

军务部改组后，原任部长和副部长的孙武及蒋翊武、张振武均被解除职务而改任有名无实的都督府顾问。

经历同侪倾轧、兄弟杯葛诸如此类的事件后，孙武和蒋翊武二人已有萌退之心，都督府顾问一职对于他们也就无所谓了。但对急于仕进、雄心勃勃的张振武而言，不啻是一记耳光。张振武也由此心生怨愤，以致引发了与黎元洪的激烈冲突。

与孙武、黄申芑、蒋翊武一样，张振武也是湖北省内少有的“骨灰级”革命元老。他生于1877年，曾于1905年赴日本留学并加

入同盟会，回国后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后于1909年加入“共进会”并成为会中重要干部。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孙武负伤入院，蒋翊武仓皇出逃，革命机关相继被破坏，“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更是惨死于总督辕门之下。危急形势下，张振武主动站了出来，他联络各方，力主提前发动起义。

举义成功后，张振武虚部长之位以待孙武，自己则以军务部副部长的名义主持军务。在后来的江夏保卫战中，张振武起到了重要的领导、指挥作用，每次革命军奔赴前线，他必亲往激励，有一次翻越壕沟时甚至险些落水溺亡。

汉阳失守、革命军士气陷入低潮，黄兴主言放弃武昌、退走南京之际，又是张振武坚辞批驳，以示反对。张振武认为，武昌和汉阳有大河相隔，北洋军要想攻下并非易事；就算能攻下，也为其他各地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至于黄兴所谓南下攻取南京，他认为不过是洪秀全般的结局，并无可取之处。为稳固军心，张振武发言时甚至以佩刀砍地，眦裂发指：“武昌为兵事重地，倘不死守，则东南摇动，望风披靡，大敌当前，有敢言弃武昌者，斩！”所言直指革命党第二号人物黄兴。

在不可放弃武昌的理由中，张振武特别强调了一点：如放弃武昌不守而南京未下，“吾鄂人士，天下无容身之地也！”会后，张振武不顾自己有伤在身而奋起驰马举旗，并沿街高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万无一失！”此举颇令民心安定。

之后，北洋军炮轰武昌，炮弹一度落入军务处并炸死炸伤卫队三十余人，一颗流弹甚至落在了会议桌旁，与会人等均吓得面如土色，唯张振武坦然笑道：“可移至楼下，照常办公，不必惊恐！”而此刻，黎元洪已逃出武昌城外，正处出奔葛店的途中。得闻黎氏如

此动作，张振武曾言辞愤慨：“黎某如此畏缩，不如乘此另举贤能！”

从一开始，张振武对黎元洪就没有好感。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再三推辞都督一职，张振武愤而直言：“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全城占领，而清朝大吏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忠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

如此“恶语”，传到黎元洪的耳中，黎元洪对张振武自也有一番衔恨在心。日积月累，彼此间嫌怨日深，面和心不和，已是军政府中公开的秘密。即便二人均在场的公开场合，张振武也对这位“床底下拉出来的大都督”颇为藐视，并曾当众斥责黎元洪：“要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你哪里有今天？”

张振武的跋扈和嚣张，程度绝不亚于孙武。譬如，革命之后他便私组卫队，并亲自配发一色短枪，他走到哪里，卫队就跟到哪里，即使去见黎元洪也不例外。身为都督的黎元洪心里虽然恼怒，但慑于张振武的“枪杆子”，很长一段时间都只敢怒而不敢言。

汉阳之役后，张振武奉命前往上海购买枪枝、弹药与服装，其间与黎元洪、孙武等人屡起冲突。黎元洪曾在给张振武的复电中称，张振武所购枪支多为不能使用的废枪，之后要购买枪炮子弹的话，必须运到湖北实验后才能付款。电文大意，实指张振武虚糜公款。张振武接电后，不思愧疚，反倒勃然大怒，竟将在上海待运的枪械分出一半给烟台革命军，而其中的款项明细又未交代。

汉阳失守后，张振武又将藩库的三十五万两银子私运到上海挥霍一空。黎元洪问他采购了多少军械、多少服装，他竟然怒斥黎元洪：“我们把你拉出来做大都督，现在已安富尊荣了，你倒清起我们的账来了！”说罢，张振武将桌子拍得咚咚响，大发雷霆而去。此说虽出于文学社员刘化欧之口，其描述未必十分可信，但也足以说明

张振武种种难容于同僚的作风。

革命党人殷子衡也说，张振武在上海遇见他时，“执手道故，倍致殷勤；唯对于军火事，则支吾其词，甚至云：‘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君当为我力助。如不愿返鄂，则可暂驻此，以等机会’”。

就事论事，黎元洪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实让张振武携现款40万元赴沪购买军事装备，但也绝非纯属个人“挥霍”，只不过张振武抵沪后将其用于广事交游、谋划另组北伐军的事上，而非黎氏所言之军备。

孙武、蒋翊武下台后，张振武已成为黎元洪“坐稳湖北、独霸一方”计划中最大的绊脚石。动乱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时，张振武手里仍握有兵权，他除了私人卫队外，还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这难免让黎元洪有如芒在背的感觉。

为褫夺张振武的兵权，黎元洪可谓是机关用尽。1912年4月初，黎元洪向“将校团”派去一名副团长。被拒后，黎元洪又企图将之编入自己掌控的第六镇。此番动作用意十分明显。张振武对此心知肚明，他非但对黎元洪严密防范，而且还计划将自己的武装扩张为一个镇（师），两人的矛盾由此日益公开化。

武昌警视厅长顾庆云被免职一事更是让黎、张矛盾迅速激化。顾庆云原是革命党人，其职位也为黎元洪的亲信所接替，张振武为此大为愤怒。他之后写信给黎元洪，称：“现在有人把约法视同废纸，把公理当成一双破鞋，升迁奖惩，任人所为。顾庆云是革命同志，与本人有过命的交情，如果有人想搞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把戏，我个人有义务去维护革命同志的权利。”张振武可能没有想到，这封信最终成了一道要他性命的催命符。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这对当时已是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来说，更是有了一番意义。此时老袁正急得挠头，思考该如何搞定乾坤。普